

集成情境的知识治理系统构建研究

梁 祺^{1,2}, 雷星晖¹

(1.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2.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要:为厘清知识治理的内在逻辑脉络,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在考虑情境因素的前提下,构建了以治理机制为中介变量,以外显情境和内隐情境为调节变量,包含知识属性、知识资源在内的知识治理系统模型。模型验证结果表明,治理机制在知识治理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外显情境和内隐情境具有正向的共变关系。另外,在具体的内隐情境中,文化的非正式特征越明显,即宽容、信任、容忍程度越明显的文化氛围,越能够抵消由知识距离、成员博弈类型对知识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知识治理系统;知识管理;治理机制;多元回归;结构方程模型;情境集成

DOI:10.6049/kjbydc.2012050768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3)11-0134-06

1 问题及理论

国外的调查表明,至少 1/3 的知识管理项目是失败的,许多企业建立的知识仓库、知识管理系统、内部知识网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1]。究其原因,学者大多认为传统理论中存在许多掩饰知识复杂性或知识活动问题的大量假设,而这些假设正好模糊了对知识与组织关系的理解,从而使人们误以为知识活动具有容易性^[2]。事实上,不仅知识本身具有极大的复杂性,而且知识活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显著特殊性的过程,为此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遭遇各种困境,达到知识组织活动的最优化,换言之,知识的活动过程需要治理^[3]。至此,肇始于对知识管理实践的反思,知识治理理论成为近几年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比如, Foss^[4]注意到大量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指出其原因在于缺乏知识管理活动的微观基础以及忽视了组织中知识治理对知识管理的先导作用,并着重分析了知觉管理动机对知识治理的影响。Chong Ju Choi^[5]则将治理机制引入知识转移研究,为更好地理解知识转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治理分析框架。Birkinshaw 以 15 家跨国公司的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知识基础特征与组织结构选择的关系; Peltokoripi 以日本 Maekawa 公司为例,分析了知识治理软、硬两方面因素对知识过程的支持作用,着重提出了包括人力资源实践、绩效评估和产出控制在内的 3 个知识治理机制; Grando-

ri^[6]根据现有组织间与组织内有关知识转移、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的实证研究,架构了一个更为微观的知识治理机制,建议从认知可能性和成本优势两个方面对机制进行评估。

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学者任志安^[3]以知识治理理论的概念、理论基础、基本思想的阐述为起点,集中讨论了知识治理的分析框架,为知识治理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王健友^[7]强调了因知识分工所导致的知识分散性、不完备性、互补性,并分析企业如何应用一系列协调机制来实现知识治理。学者李廷翰^[8]从项目及部门两个角度,对现有知识治理模式进行区分、比较、分析,指出知识治理研究缺乏实证分析以及实践中没有明确知识治理部门在企业组织中所处位置。罗珉^[9]构建了一个以知识资源与知识特性为自变量,知识分享途径为干扰变量,知识治理绩效为因变量的研究架构,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治理绩效,为知识治理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此分析思路,王睢、王红丽^[10,11]将研究视角转向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知识治理问题,前者基于认知的角度,将情境组合观和流程设计观有机结合,运用跨案例研究,构建了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知识治理理论框架;后者则实证分析了以合作创新为共同目的的组织知识治理绩效问题。

总体而言,这些成果都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是,知识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对散布和嵌入的知识进行认知和协调,促进组织知识活动,优化资

收稿日期:2012-08-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33)

作者简介:梁祺(1976—),男,江西景德镇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雷星晖(1964—),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务、战略管理。

源配置,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本文认为知识治理是包含知识特性、知识活动过程、治理机制、企业绩效等多种要素的整体,且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仅考虑知识治理的某些局部要素,缺乏从全局角度对知识治理过程进行分析,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综上所述,本文从系统分析的视角,引入系统科学理论,通过整合知识治理的相关要素,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合理性检验,以期从系统的角度,整合和探究知识治理活动。

2 知识治理系统构成

2.1 知识治理系统定义

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学者从自身研究视角对知识治理进行定义,主要观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知识治理概念汇总

概念提出者	定义描述
Foss (2003)	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结构和机制,以优化知识活动过程
Grandori (2001)	对企业内和企业间知识交换、转移、共享的治理
Peltokorpi、Tsuuyuki (2006)	是对以促进企业成员贡献知识为目的的正式、非正式机制的集合
Mahnke、Pedersen (2004)	为促进价值创造,以科层、共同体和激励为机制而实施的对知识流动的治理
Zyngier、Burstein (2006)	分配权力和资源,审查、规制、监督和修正知识管理过程,实施知识管理战略
De Moor (2005)	管理或治理知识及智力资产的一种模式
Choi、Russell (2005)	影响知识活动的治理结构,包括交换、合法资格和赠与

资料来源:王健友.知识治理的起源与理论脉络梳理[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6):19-26.

综合这些观点,知识治理系统至少涉及知识特性、知识活动过程、知识治理机制要素等。然而,本文认为,情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与知识及知识活动密切相关,对知识实践影响广泛。知识及知识活动的实践意义只有在一定情境、社会空间下,才能充分体现出来(Despres 2000)。但是,从以往文献讨论来看,缺乏对情境因素的考虑^[11]。为此,本研究提出的知识治理系统是在具体情境中,整合利用企业各种知识资源,借助治理机制来实现降低知识活动成本、蓄积知识资产、提升商业价值的治理绩效系统。

2.2 知识治理系统结构

由定义延伸,本文认为,完整的知识治理系统由知识属性、知识资源、知识活动情境、治理机制 4 个子系统构成。

2.2.1 知识属性子系统

作为知识活动客体,知识本身的特性会影响知识活动效果。

(1)默会性。知识的默会性会阻碍知识活动。Lip-

pman、Spender 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知识的模糊不清是导致知识转移困难的重要因素;Kogut 也认为知识难以传授及其复杂性会造成知识转移困难。

(2)嵌入性。Argote 指出,企业中的知识一般会嵌入在人员、工具、任务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若干网络中。一方面,嵌入性会使成员各自的知识及其知识行为难以被其他成员直接观察到,为合作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嵌入性突出了隐性知识的“默契”性并依赖于个人与组织的互动关系,这导致组织知识具有一定粘性,进而影响组织结构、治理机制完善和知识使用效能^[9]。

(3)公共性。知识一旦被表达出来并予以公开,其具有的公共品属性促使搭便车行为增多,从而减弱从事知识创造活动的积极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₁:知识属性对知识治理效果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

H₁₁:知识默会程度越高,对治理效果的负向影响越大;

H₁₂:知识嵌入程度越深,对治理效果的负向影响越显著;

H₁₃:知识的公共性特点越突出,机会主义动机越强,对治理效果的负向影响越显著。

2.2.2 知识资源子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企业就是知识处理器,即不断利用知识资源解决面临的问题,进而将此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性知识累积到组织知识系统中,由此形成一个知识利用、反馈、累加的螺旋上升循环。而知识治理本身就是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现阶段知识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下一阶段治理效果的显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知识资源的多寡会影响知识治理效果。

具体而言:

H₂₁:企业拥有的员工知识资源越多,知识治理效果越趋于满意;

H₂₂:企业拥有的组织知识资源越丰富,知识治理效果越好;

H₂₃:组织拥有越丰富的利益相关人知识,对知识治理效果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2.2.3 知识活动情境子系统

情境是与事件、事实等相关的条件或环境。如果承认事物一旦离开特定环境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那么情境就应该是知识治理的一个基本要素,其刻画了知识和知识活动发生时的重要形势特征^[12]。一般而言,情境分为外显情境和内隐情境。前者以显式的方式出现,比较容易识别并可表示和描述的;后者比较难以识别和获取,更多地依赖于经验、直觉和洞察力,其涉及相关知识活动主体的心理、精神状态、认知能力等。其中:

(1)在外显情境中,知识活动过程制度化以及知识

活动信息化,是知识活动有效进行的基础条件。比如,在知识共享及应用过程中,组织部门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必然依托于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及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持。因此,本文假设:

H₃:外显情境直接影响知识治理效果。

具体来说:

H₃₁:企业知识制度化程度越高,知识治理效果正向趋向越明显;

H₃₂:企业信息化程度越完善,知识治理效果越好。

(2)内隐情境,其实质是体现知识治理的主观特征。只有知识主体有参与知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主动分享自己的知识,积极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进行创造性应用,进而将创造性活动获取的高价值知识进行新一轮分享,如此螺旋上升,不断缩小知识共享的沟壑,丰富企业知识积累,正向推进知识治理效果。这一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是能动意愿,因为在交流双方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知识背景、处于较高的信任水平以及宽松、非正式特征浓厚的合作氛围中更加易于产生。在参考部分学者^[11,13]的观点后,本文就内隐情境提出如下假设:

H₄:内隐情境会影响知识治理效果。

具体而言:

H₄₁:企业员工知识距离越小,知识治理效果越好;

H₄₂:企业成员博弈类型越明显,对知识治理负向影响越大;

H₄₃:企业文化非正式特征越明显,对知识治理正向影响效果越显著。

(3)情境具有调节作用。知识活动的核心在于知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但是知识属性以及知识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知识治理的最大挑战在于找出最适合的知识转移情境,以有效分享内隐性或复杂性知识。显然,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知识活动制度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知识共享,甚至包含隐性知识的共享成效呈正比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内隐情境着眼于知识主体的主观性因素,其对知识主体在知识活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产生内在影响。比如,在非正式文化特征明显的情境中,知识主体一旦感受到信任以及情感的存在,其贡献自有知识、学习他人技能、分享学习经验的积极性会随之提升。为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

H₅₁:外显情境对知识属性的知识治理效果有调节作用;

H₅₂:外显情境对知识资源的知识治理效果有调节作用;

H₆₁:内隐情境对知识属性的知识治理效果有调节作用;

H₆₂:内隐情境对知识资源的知识治理效果有调节作用。

(4)外显情境、内隐情境相互促进,情境本身并非孤立存在。一方面,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知识活动制度等外显情境内容,都会对企业文化,以及活跃在此氛围中的知识主体的主观特征产生影响。换言之,表

征知识活动主体主观特征的内隐情境,不可避免会上所处阶段的外显情境烙印。而另一方面,内隐情境的变化又会促使企业决策层重新考量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知识活动制度的完善情况。因此,二者关系是相互影响、共同促进。进而,本文假设:

H₇: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关系。

2.2.4 治理机制子系统

王健友^[14]基于知识分工的角度,将治理机制具体化为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和认知机制。其中,动力机制主要围绕组织战略不协调问题,就如何促进成员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等活动展开。协调机制主要处理机会主义和利益不协调问题。认知机制是在出现认知差异和认知冲突时,用于统一成员对知识价值的判断。显然,三种机制间的相互作用会促进知识主体行为与组织知识活动相互调适,进而推动知识治理绩效的提升。同时,应该注意到,三种机制在本质上都是以知识为制度调整对象的。因此,知识本身的特性以及知识资源的多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知识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进而间接对知识治理绩效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假设:

H₈:三种机制在知识治理系统中发挥中介作用。

2.3 知识治理系统功能和概念模型

知识治理的本质在于对知识管理所涉及的行为进行激励、引导、规范和控制,其目的是引导企业创造新知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生产创新产品,实现知识资本增值,提升企业价值^[15]。因此,本文认为,知识治理绩效,即知识治理系统的功能直指智力资本和企业价值。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概念模型,见图1。

3 模型检验

3.1 问卷设计

本文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前提下,基于上述分析,设计了概念模型的调查问卷,并设定各题项衡量方式采用Likert5点量表,具体测度指标及参考来源见表2。

表2 知识治理系统测度指标

研究变量	测度指标说明	参考理论来源
知识属性	默会性、公共性、嵌入性	Jaime (2000)、JingTao Yu(2007)
知识资源	员工知识、组织知识、合作伙伴知识	Lado (1994)、Probst (2000)、MinLuo(2010)
外显情境	制度化、信息化	Andrew (2001)、Cohen D(1998)
内隐情境	知识差距、博弈类型、文化特征	Ahn H J(2005)、choo A S(2007)
治理机制	动力机制、协调机制、认知机制	任志安(2007)、王健友(2007)
知识治理绩效	财务绩效、组织效能	Sveiby (1997)、Kalpan (1996)、Ambler(2001)、Riley (2005)、Sullivan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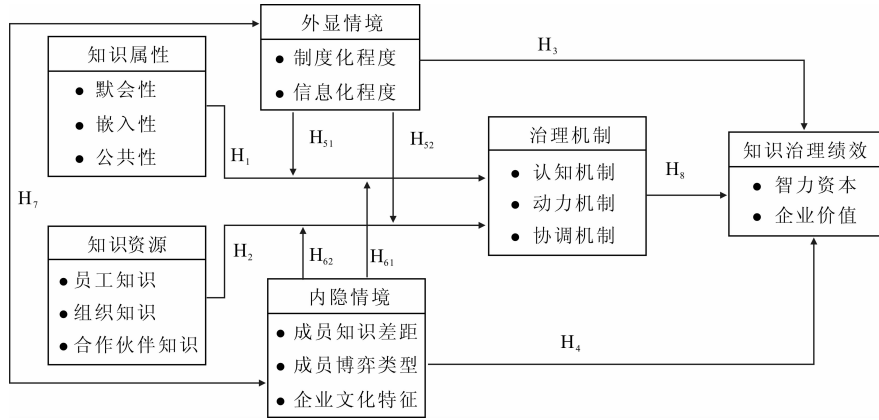


图 1 知识治理系统概念模型

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共收到反馈问卷 91 份。从企业分布来看,出于样本来源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陶瓷、电子、交通、工程设计领域,而金融、中介、制药、食品领域也有少量企业。成立 3 年以上的企业数占到 94.7%,员工人数集中在 30~100 人之间的企业数占 79.1%。员工年限在 3~7 年的居多,其中从事技术的员工占 61.5%,从事管理的占 39.5%,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学历以上的占 85%,符合本研究要求。

信度分析能考察量表的可靠性程度,一般采用 Cronbach's 系数检验。本研究调查问卷所有项目的信度 α 值都在 0.641 以上,符合研究需要。同时,由于量表内容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且在题项表达上也与项目组有关专家进行了反复探讨,因此问卷的内容效度理应符合要求。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KMO 样本测度为 0.82,远高于 0.5 的最低标准,同

时 Bartlett 半球体检验值小于 0.001,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零假设。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根大于 1 和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进行因素抽取,将数据输入到 SPSS 17.0,得到六因素结构,且各变量对应因子的载荷较好,方差总和的 74.23%可被这 6 个因素解释。综上所述,设计问卷的调查题项较为合理。

3.2 回归分析

从以上分析易于发现,知识治理系统模型是一个兼有自变量、因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混合模型。由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包含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模型较为少见,为此本文在分析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时,采用学者温忠麟^[16]研究有中介调节变量的思路,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通过逐步加入变量的方式,借助线性回归模型,最后显现主要处理结果,具体见表 3 所示。

表 3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知识治理绩效)			因变量(治理机制)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知识属性	-0.127	-0.087	-0.105 *	-0.094	-0.087 *
知识资源	0.243	0.372 *	0.315 *	0.118	0.123 *
外显情境	0.2777 **	0.337 **	0.285 **	0.149 *	0.138 **
内隐情境	-0.114 **	-0.214 **	-0.097 **	-0.087 *	-0.079 **
知识属性×外显情境		0.232 **	0.189 **		0.147 **
知识属性×内隐情境		0.149 **	0.114 **		0.145 **
知识资源×外显情境		0.347 **	0.412 **		0.386 **
知识资源×内隐情境		0.108 **	0.229 **		0.277 **
治理机制			0.324 **		
Adjusted R Square	0.647	0.782	0.773	0.745	0.812
F	320.403	227.165	245.438	276.597	197.573

从 model1 的结果来看,外显情境 ($\beta = 0.277, p < 0.001$) 对知识治理存在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内隐情境 ($\beta = -0.144, p < 0.001$) 对知识治理的作用同样达到显著。为此,假设 H₃、H₄ 得到验证。从 model2 的数据易于发现,反映调节效应的交互乘积变量的结果均为显著。其中,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属性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分别为 ($\beta = 0.232, p < 0.001$)、($\beta = 0.149, p < 0.001$),而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资源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分别为 ($\beta = 0.347, p < 0.001$)、

($\beta = 0.108, p < 0.001$),分别验证了假设 H₅₁、H₅₂、H₆₁、H₆₂。而在 model3 中易于发现,中介变量即治理机制对知识治理的正向效果 ($\beta = 0.324, p < 0.001$) 达到显著。因此,假设 H₈ 得到验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比 model3 与 model5 的结果可以发现,不仅在以知识治理绩效为因变量的 model3 中,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属性、知识资源作用于知识治理效果的调节效用显著,分别达到 ($\beta = 0.189, p < 0.001$)、($\beta = 0.412, p < 0.001$)、($\beta = 0.114, p < 0.001$)、($\beta =$

0.229, $p < 0.001$),而且以中介变量,即治理机制为因变量的 model5 中,外显情境、内隐情境的调节作用同样显著。这表明,外显情境、内隐情境的调节效果一部分是直接发生的,一部分是通过治理机制来发挥作用的。但是,对比以知识治理绩效为因变量的 model1 和以治理机制为因变量的 model4,其结果均无法证实知识属性、知识资源对知识治理绩效的作用,进而无法清楚显现治理机制的中介变量性质,即 H_1 、 H_2 并未在回归分

析中得到证实。为此,本文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治理机制的中介作用。

3.3 结构方程模型对比分析

为验证治理机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综合比较了 6 个嵌套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其中,model1、model2 用于分析治理机制的部分中介作用,model3、model4 用于分析治理机制的完全中介作用,model5、model6 表示无中介作用的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的对比分析结果

嵌套的结构方程模型	χ^2/df	RMSEA	GFI	NFI	PNFI
知识属性→治理机制→治理绩效 & 知识属性→治理绩效(model1)	2.582	0.074	0.93	0.95	0.692
知识资源→治理机制→治理绩效 & 知识资源→治理绩效(model2)	2.577	0.077	0.92	0.94	0.684
知识属性→治理机制→治理绩效(model3)	2.724	0.081	0.95	0.93	0.674
知识资源→治理机制→治理绩效(model4)	2.721	0.084	0.94	0.93	0.662
知识属性→治理绩效(model5)	3.072	0.087	0.92	0.92	0.634
知识资源→治理绩效(model6)	3.071	0.082	0.94	0.91	0.621

对比以上模型,可以发现,从 model1、model2 到 model5、model6 是不断简约的过程,其自由度逐步增加。但是,model5、model6 的拟合优度明显不如前面 4 个模型。因此,应该接受治理机制对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至于此类作用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需要再次对比 model1、model2 和 model3、model4。结果显示,model3、model4 的 RMSEA 虽高过临界值 0.08,但却小于 0.1,即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表达与样本数据契合程度的指标 GFI, model3、model4 优于 model1、model2 的表现。再结合 NFI、PNFI 指标,本文认为,虽然部分中介模型 model1、model2 和完全中介模型 model3、model4 在检验指标上均可以通过,但综合对比下,应该接受治理机制为完全中介的 model3、model4 模型,即假设 H_1 、 H_2 得到验证,路径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研究假设	路径 γ	验证结果
知识属性→治理机制 (H_1)	-0.172*	成立
知识资源→治理机制 (H_2)	0.223*	成立
外显情境→治理绩效 (H_3)	0.612**	成立
内隐情境→治理绩效 (H_4)	-0.492**	成立
外显情境→治理机制 (H_5)	0.279*	成立
内隐情境→治理机制 (H_6)	0.326*	成立
内隐情境↔外显情境 (H_7)	0.472***	成立
治理机制→治理绩效 (H_8)	0.773**	成立

注:路径 γ 为标准化参数。*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 结论与展望

知识治理以知识及知识活动过程为管理对象,侧重于对知识进行管理的总体架构和运行机制的安排,为此知识治理内容应包含知识特性、知识资源、知识活动等情景因素以及知识治理机制要素。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整合上述分散要素,形成了知识治理系统概念模型,进而实证检验了模型的各个假设。从数据结果来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无论是企业拥有的知识资源,还是知识本身的属性,即知识的默会性、公共性、嵌入性特征,对知识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在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属性、知识资源对知识绩效的直接作用($\beta = -0.127, p > 0.05$)、($\beta = 0.243, p > 0.05$)。然而,在考虑治理机制后,结构方程模型的因果路径分析表明,无论是知识属性、知识资源到治理机制的路径($\gamma = -0.172, p < 0.05$)、($\gamma = 0.223, p < 0.05$),还是治理机制($\gamma = 0.773, p < 0.01$),均达到显著。显然,知识属性、知识资源二者主要通过动力机制、协调机制、认知机制,间接影响治理绩效。因此,对于重视知识治理效果的企业而言,应将关注点放至各类治理机制的安排上,即知识员工的激励、知识资源的配置、知识主体利益协调制度的设立和实施。

(2)知识资源和知识属性通过治理机制来影响治理绩效,故应该将其置于相应的情境中讨论。因为在知识治理系统中,无论是包含信息技术、管理制度在内的外显情境,还是以知识距离、博弈类型、文化特征为主要内容的内隐情境,均有调节作用。由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属性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分别为($\beta = 0.232, p < 0.001$)、($\beta = 0.149, p < 0.001$),而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资源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分别为($\beta = 0.347, p < 0.001$)、($\beta = 0.108, p < 0.001$)。为此,情境的调节作用明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属性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变为($\beta = 0.147, p < 0.001$)、($\beta = 0.145, p < 0.001$),而外显情境、内隐情境对知识资源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变为($\beta = 0.386, p < 0.001$)、($\beta = 0.255, p < 0.001$),同样满足显著性条件。这就表明,情境的调节作用部分是通过治理机制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即信息技术、管理制度越趋于完善,知识资源、知识属性借助于治理机制作用于治理绩效的路径就越畅通,而内隐情境同样刻画了知识和知识活动发生时的重要情景特征。此类特征正

向强度的不一致,会对知识资源、知识属性着力于知识治理效果的路径产生不同影响。这种影响受到情境设置的制约,同时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能忽略。

(3)任何活动都受其所处情境的影响,知识治理活动也不例外。为此,情境本身就对知识治理存在直接影响。从简单的回归结果($\beta = 0.277, p < 0.001$), ($\beta = -0.114, p < 0.001$)易于发现,外显情境对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信息技术、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会正向影响知识治理效果。内隐情境虽总体呈现负向影响,但是在做一次简单回归后,可以发现知识距离($\beta = -0.149, p < 0.001$)、博弈类型($\beta = -0.117, p < 0.001$)、文化非正式特征($\beta = 0.203, p < 0.001$)均对知识治理效果有显著影响。为此,文化非正式特征越明显,即宽容、信任、容忍性越明显的文化氛围,越能够抵减由知识距离、成员博弈类型对知识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结构方程模型的因果路径($\gamma = 0.472, p < 0.001$)可以看到,外显情境和内隐情境二者之间具有正向共变关系。为此,外显情境的内容完善会对企业文化,以及活跃在此氛围中的知识主体的主观特征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内隐情境的变化又会促使企业决策层重新考量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情况,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另外,本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在验证知识治理系统的普遍性时,选取的样本尽可能从多个行业中遴选,以使研究具有普遍适应性。从结论来看,一改过去仅重视知识资源及知识本身属性对知识治理效果影响的视角,从而指出情境的调节作用、治理机制的中介作用是整个知识治理系统的核心。同时,以实证数据说明,情境的调节作用需要借助理治理机制的完善,从而在管理实践上指导企业加强外显情境各组成部分的建设,以及内隐情境各分支变量的调整,深入分析认知机制、协调机制、动力机制在知识治理制度安排中的地位,促使其把握组织形式、组织机制、知识协调的内在机理,为其进行知识治理模式选择提供参考。

在本知识治理系统中,并未考虑知识治理结构的影响。事实上,以自上而下为特征的科层制治理结构和以契约维系各方关系为特点的市场制治理结构,反映了资源配置方式、治理模式和控制关系的不同,对治

理机制的作用效果是相异的。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建立有效的知识治理机制以及反映不同治理结构下治理机制对知识治理绩效的影响将是重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1] FOSS N J. Alternative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he knowledge movement: from macro bias to microfoundations and multi-level explanation[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6): 16-28.
- [2] SCOTT FERNIE. Knowledge sharing: context, confusion and controvers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3(21): 177-187.
- [3] 任志安. 超越知识管理: 知识治理理论的概念、框架及应用[J]. *科研管理*, 2007(1): 20-26.
- [4] NICOLAI FOSS. Sources of subsidiary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means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2(8): 49-67.
- [5] CHONG JU CHOI. Knowledg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5(6): 67-74.
- [6] 张爱丽. 国内外知识治理研究综述[J]. *中国科技论坛*, 2011(12): 121-127.
- [7] 王健友. 知识治理的起源与理论脉络梳理[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6): 19-26.
- [8] 李廷翰. 组织知识治理模式研究[J]. *情报科学*, 2009(12): 1780-1783.
- [9] 罗珉.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治理绩效研究[J]. *科研管理*, 2010(5): 1-9.
- [10] 王隼. 开放式创新下的知识治理—基于认知视角的跨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3): 45-53.
- [11] 王红丽. 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的知识治理绩效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1(6): 949-960.
- [12] JUAN IGNACIO. EFQM model: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8, 9(1): 133-156.
- [13] JINGTAO YU. The outside new technology derive research: mode, context and performance[M]. 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4] 王健友. 知识治理研究—企业的知识本质与组织机理分析[D]. 天津:南开大学, 2007.
- [15] BONTIS N. Intellectual capital: an exploratory study that develops measures and models[J]. *Management Decision*, 2007, 1(1): 223-247.
- [16] 温忠麟.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 *心理学报*, 2006(3): 448-452.

(责任编辑:胡俊健)